

内容提要

1989年全国性学潮、动乱和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说明：“阶级斗争熄灭论”是错误的，忽视和轻视阶级斗争的观点也是错误的。近十年来我们一些同志陶醉在“太平盛世”的幻想中，但也正是阶级斗争由暗到明，逐步发展和升级的时期。这是我们对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缺乏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悲剧所在。

剥削阶级消灭以后，由于阶级斗争的自身规律和国内国际诸多因素决定，阶级斗争呈现出隐蔽性、多变性和长期性。敌对势力可以接过我们改革、开放的口号，利用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他们还可利用现实中的人民内部矛盾，裹挟大批群众，挑起事端，造成我们难以对付的局面。如果我们失去警惕，仍可能酿成急风暴雨式的斗争，出现人头落地，政权丧失的危险。

当今形势下“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成为阶级斗争的总特点。社会主义制度会不会蜕变为资本主义，现在已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已成为一个紧迫的实际问题，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考验。如何避免可能的危险，关键是要看执政党的建设状况。执政党必须对当今时代、国际范围内的错综复杂的斗争，有清醒的认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关系。与这些问题相联系，对过去讲的如“有砖无墙论”，“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党会不会变修”等问题，都值得重新认识和重新研究。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阶级斗争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当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如何对待和处理新形势下的特殊的阶级斗争，实践告诉我们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极端重要的问题。这不仅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如此，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来说也是如此。

我们党在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上，总的说没有出现不可挽回的损失，但是也有过沉痛的教训。“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一段时期，人所共知，我们犯过“左”的错误，造成了很大损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纠正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是在一段时期内又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忽视阶级斗争的方面，对待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认识时明时暗，实际处理又软弱无力。尽管党中央的一些重要文献中明确指出：剥削阶级消灭以后，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可是实际上对这样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上已置之脑后，包括我们党的两位前总书记。曾有一段时间竟出现一提阶级斗争就被看作是极“左”思潮，或者是过时的“传统”观念，加以批判。结果不仅在思想理论上造成一定的混乱，实践上也使我们受到惩罚。

十多年来是不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中国大地上真的没有阶级斗争了呢？只要回顾一下事实，不难作出肯定的回答。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胜利地实现了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然而就在当时有人却趁我们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之机，要“纠正”社会主义，“纠正”马克思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人民民主专政。针对这种思潮，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也竟被一些人骂作“四根棍子”。1980年初，党中央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人又在“总结经验”的借口下，公开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妄图解除我党的精神武器，为他们全面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正确领导打开缺口。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抵制了这股错误思潮，维护了党的原则立场。紧接着到1981年，有人又变换手法，赤裸裸地丑化社会主义，丑化共产党的领导。以《苦恋》改编而成的《太阳与人》这部电影为代表，制造舆论要人们“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由于这股思潮当时只受到软弱无力的抵制，到1983年有一些人又打起了“研究问题”的幌子，抄袭、贩卖西方资产阶级抽象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理论，污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蜕变的‘非人道’”的社会主义，“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思想，散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共产党的不信任情绪”。这次“污染”受到邓小平同志的严厉批评。但是由于当时的总书记的袒护，实际上没有起多大作用。一波未平，又起一浪，到1985年，还是这些人又打起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的旗号，向

党向社会主义发难，污蔑社会主义“不民主”，共产党实行“封建专制”。进而抛出了他们改造中国的“全盘西化”的纲领。一时间美化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多党制”等资本主义的理论观点纷纷上市。就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这种喧嚣下，蒙蔽了一些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1986年闹起了学潮，1987年再起学潮，直至1989年由学潮发展为北京56天的惊心动魄的反革命暴乱。

十多年来，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每隔一年多不到两年就起一场风波。斗争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要害是否定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扭转社会主义方向。反复的斗争本来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但是在北京56天动乱之前，许多人是不清楚的，甚至我们的上层领导也是不敢面对现实，不予说清楚的。56天的动乱牵动了亿万人的心，事态发展到了急风暴雨式的斗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顷刻之间有被推翻的危险，直至这时才使一部分人方醒大悟：原来这是一场夺权与反夺权的阶级斗争。但是仍有不少人认为搞动乱的那些人是“爱国”，甚而去“声援”。悲乎！悲乎！多么危险。

从1989年的风波，我们看到什么呢？

（一）**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一再警告，四项基本原则是不允许反对的。但是他们根本不听，相反恶作剧愈演愈烈。正像群众说的，敌视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是得寸进尺，我们宽容一分，他们则猖狂十分。

（二）**斗争一直没有停止**，然而我们的同志却陶醉在“太平盛世”之中。我们尽管叫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是什么性质，含糊其辞，不敢提高到阶级斗争高度来看问题。长时期的低调宣传，某种程度上麻痹了人们的思想，使许多人失去了警觉，到头来落个自啃“苦果”。

（三）**动乱是坏事，也是好事**。56天惊心动魄的斗争，好似惊雷，震聋发聩，使一些人从“人间充满爱”的催眠曲中猛醒过来：“太平盛世”并不太平。原来中国大地上依然存在着不安定的因素，随时还有“地震”的危险。幸哉！吃了一堑，长了一智。

二

事实胜于雄辩。痛定思痛，不免使人愕然，又不能不勾起人们的反思：社会主义经历了七十多个年头，中国社会主义也建设了四十余载，怎么还会发生这种风波？

邓小平同志在北京动乱后深刻地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笔者认为认识这种“大气候”、“小气候”是必要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认识酿成这种“气候”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原因注定了必然要发生这种风波呢？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反复性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这是我党对新时期阶级斗争状况的科学概括。这里明确指出了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但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而且

“长期存在”，甚至还可能“激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着长期的、复杂的、反复的阶级斗争的基础：

（一）**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了，但是剥削阶级的残余及其影响还存在。**社会主义可以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消灭剥削阶级，但是不能在短时期内消灭剥削阶级的所有成员。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剥夺他们的经济占有，使剥削阶级作为完整的阶级的历史地位被摧毁，但是他们的绝大多数成员将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接受改造。其中多数可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也有一些顽固不化之徒会与人民对抗到底。他们随时妄想把丢掉的“天堂”夺回来，随时想把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另外，地主资本家阶级曾是占据历史舞台较长的统治阶级，他们在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生活习惯、道德规范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形成了稳定的社会机制和影响，对这一套，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立即“剥夺”的。它们将长期影响社会，与社会主义形成长期的矛盾和斗争。列宁曾经指出：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管理国家、军事和经济的‘艺术’，使他们具有很大的优势，所以他们的作用与他们在人口总数里所占的人数相比，要大的不可估计”。^①

（二）**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了祖国的统一，国家将实行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港、澳、台资本主义制度并存的“一国两制”的制度。**这是祖国统一大业的需要，但终究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制度。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斗争是自然的，这中间谁改造谁，谁战胜谁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种斗争不是大陆广大人民与大陆剥削阶级残余分子的斗争，而是在一定范围内的面对面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还难以彻底杜绝产生新的剥削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可能。**我国现在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一起发展的方针。外国独资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中外合资企业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此外还有私营经济和个体劳动者所有经济。虽然这些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而且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但毕竟不是或者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依托上述经济成分的阶级、阶层，有的本来就是资产阶级，有的虽然是劳动者，但在商品经济规律作用下，必然要使少数人分化成非劳动者，变成剥削者。另外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短期内不可能消除违法乱纪，甚至违法犯罪活动。事实上还不断滋生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走私贩私团伙和新剥削分子。在党内，国家机关里也有少数以权谋私，行贿受贿，同社会上的犯罪分子勾结侵吞国家和人民财产的腐败分子。所有这些都是新的社会制度下受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影响产生出来的反社会主义势力。这种现象的存在也是长期的。

（四）**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很大程度上又是与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相联系的。**阶级斗争历来不是囿于一国的孤立现象。尤其是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总是与国际上的阶级斗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今时代，西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处心积虑地干涉、破坏、控制、覆颠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派遣特务，在社会主义国家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打进去，拉出来，沆瀣一气破坏社会主义。现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内阶级斗争的重要特点。只要在

^① 《列宁选集》第4卷，922页。

世界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存在一天，这种斗争就会存在一天。

由于上述国内因素和国际影响，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斗争的存在不仅是客观的，而且也是长期的。从1989年我国发生的风波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反复性很大的，有时斗争达到很激烈的程度，达到人头落地，江山丢失。由此我们还需要对下列两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认识：

(1) **敌视社会主义的残余势力问题。**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我们面对的已不是过去那种占统治地位的完整的反动阶级，而是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和新生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党把这种形势下的阶级斗争叫做“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对这种形式的斗争容易产生轻敌麻痹思想。六十年代初有过一种“有砖无墙”论的观点，认为剥削阶级好比一堵墙，已被我们推倒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些散落之“砖”，他们成不了大气候了。这种观点只是从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成员的存在形式看问题，而缺乏辩证思维，看不到阶级斗争的多变性。从我国发生的动乱以及东欧国家的巨变事实，使我们看到敌对势力的残余分子，在一定气候和条件下，仍然可以重新聚集，实现某种结合，达到一定程度便可形成具有一定经济依托、政治上有统一纲领、路线、组织上有紧密联系的反动派势力，掀起更大规模的斗争，对无产阶级专政构成严重的威胁。这种情况北京动乱中就反映得十分清楚：那里有旧的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社会上的各种犯罪分子，“暴发了”的新生的反革命分子，知识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港澳、台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特分子等。正是这些社会的沉渣余孽聚合起来，便掀起了一场瀚然大波。这就告诉我们，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散落之砖”在一定条件下仍可以重新垒起反社会主义之“墙”。这种现象已经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在一些地方已成为事实。

(2) **反革命残余势力的经济基础问题。**过去我们对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的存在基础，有个形象的说法：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可是就近几十年的国际风云，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及我国发生的风波看，对“毛将安傅”的问题也应辩证地观察。实际情况是反革命残余势力的聚集和结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在寻找经济依托的过程。他们可以扎根在国内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甚至依托到蜕变了“公有制”经济上，也可以找到国外反社会主义势力的经济“援助”。列宁曾经讲过：剥削者“还有国际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部分”^①从现代情况看，国际资本的经济“援助”是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重要经济基础。北京动乱中的那些“精英”就得到了海外敌对势力的大量经援。一些成员不是在瞬息之间就变成了腰缠万贯的“暴发户”吗？在某些国家掀起风波的什么“会”，什么“派”，什么“党”，也常常是得到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经济援助的。能说他们没有经济依托吗？实际上是“旧皮不存，毛将新傅”。对反革命残余势力是否有经济基础所依托，我们一定要辩证地认识，有清醒的头脑。

“有砖无墙”可以变成“有砖有墙”，“旧皮不存，毛将新傅”，这是新形势下特殊阶级斗争动态观察的可能结果。我们不是讲社会主义制度有可能蜕变为资本主义吗？其基础就在于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而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非历史的必然，但偶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种观察也非简单的推理，而是在我们的视野之内已见兆头。列宁讲过：“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了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92页。

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灭（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们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①。

三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呈现什么形式，既非人为规定，也不是固定不变，而是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发展不断变化的。观察近十几年来的斗争，可以看出下列一些新特点：

（一）制造否定社会主义的舆论，进而贩卖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十多年来的斗争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展开的。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成为新时期阶级斗争的主战场。毛泽东同志说过：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去占领。尤其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所能动用的最廉价，最方便的武器，也就是散布资产阶级及其它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资产阶级要散布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必然要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正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的时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则掀起了“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思潮。他们借批判毛泽东同志的个人“迷信”，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借改正冤假错案之机，进而否定党的正确领导和党的光辉历史；从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到借批判“穷过渡”，进而全面否定社会主义。一个时期，我们的革命领袖被污蔑为“封建暴君”，毛泽东思想被歪曲成“封建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历史被骂成是“整人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被诬为“贫穷的”、“落后的”、“涂上了油彩”的“愚昧”的社会制度。掀起“否定一切”的“翻案风”，是敌对势力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大策略手段。这种现象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普遍现象。如果开初人们还不太清楚，那么现在可以说敌对势力的这种“策略”已是“司马昭之意，路人皆知”了。我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士”们，采取这种手法一方面是要搞“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有意把“水搅浑”，进而贩卖他们的资产阶级建国方案。不是吗？请看十几年来的事实，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社会观、价值观等，不是大量地从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新闻、艺术、文学、伦理方面“放”了出来吗？较长时期搞得鱼目混珠，是非不清，扑朔迷离，无所适从。正是在这种一片混浊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破烂货——“自由”、“民主”、“人权”也竟然在中国有了“市场”。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全盘西化”也可以招摇过市。毛泽东同志讲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制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十多年来的斗争，再次证明了这一条真理。

（二）接过“改革、开放”的口号，妄图扭转社会主义方向。改革、开放、搞活是我党为了使社会主义制度臻于完善，进一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提出和采取的正确口号和政策方针。我们党认真贯彻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政策，在短短的十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来说，他们根本不是要的这种改革，他们是在改革的口号下，要把社会主义制度扭转转到资本主义轨道上去。马克思主义告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818页。

诉我们，在阶级社会，敌对势力往往利用革命的口号干反革命的勾当。我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士”们曾经是改革的“非常积极”的“支持者”，他们随改革的潮流登场，改革的口号喊得最响，有的还捞到了“改革家”的桂冠。他们以批判“极左”、“保守”为名，赢得了一些头脑不清醒的人的支持，从而也蒙蔽了一些群众。一个潮流过来，总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明眼人那里，鱼目也是难以混珠）。后来有人实际上把“改革”口号翻过来变成他们向党发难的“炮弹”，每每攻击我们党“不改革”或“改革不彻底”，并以此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甚而成为他们煽动人们闹事的借口。现在我们看得更加清楚了，在改革、开放这个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就是在经济上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他们却要全面实行私有化；我们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他们却要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我们坚持按劳分配为主，而他们要实行按资分配为主。在政治上，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他们要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人权”那一套；我们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他们要资产阶级“三权分立”；我们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他们要赶走共产党后实行多党制等等。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要什么样的改革，方励之说得很清楚。香港《时报》报道方在香港说：“大陆的出路，就是资本主义，整个要改弦更张”，并说“一定要彻底批判毛泽东思想才能改革，不能绕开这个关键问题”。可见两种改革，真是南辕北辙。

改革，现在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有社会主义的改革，有资本主义的改革。近十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赞赏”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美国政府可以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支持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不受挫折”。1989年北京动乱前夕，美国某基金会自愿为中国提供数百万元作“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但是当动乱被平息后，美方马上终止了这项“援助基金”。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要援助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呢？是关心社会主义吗？是为了“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吗？恐怕不那么简单。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判断一个人或一个党派，不是看他宣传什么，而是要看他们宣传的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贯彻社会主义改革方针时，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被假象所迷惑，以保证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三）夸大人民内部矛盾，裹胁群众给政府施加压力。北京动乱说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士”们是充分利用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夸大大部分人民群众同党和政府的矛盾，钻空子，蛊惑人心，煽动群众闹事，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少数敌视社会主义分子挑起阶级斗争的一种重要表现。社会主义作为发展中的社会，自然存在着若干社会矛盾，党和政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即使取得很大成绩，也难免出现一些失误，或存在一定的缺点。对这些，群众有一定的意见是自然的。如近年来我们的党风不正，社会风气不好，引起群众一定程度的不满。党和政府也正在采取措施加以克服和改进。但是那些别有用心心的“精英”们，却利用我们前进中的困难，把内部矛盾夸大，对党和政府肆意中伤，甚至造谣惑众，挑起事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以“为民请愿”者自居，煽动、裹胁群众，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妄图借“群众”之力迫使政府就范。反革命分子毕竟是少数，要闹事自感军孤力薄，只能借助“群众”之力。马克思讲过，反动阶级当他们需要群众的时候是“崇尚”群众的，他们还会厚着脸皮把自己吹捧为“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但当他们的目的达到后，就会把群众一脚踢开。人们不理解建国四十多年，竟然在北京能出现十几万，几十万人上街的事情，原因就是极少数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利用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突出的矛盾，把多数群

众的合理意见和要求引上了错误的方向。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混杂，敌我矛盾淹没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之中，使我们一时难以分辨是非，像邓小平同志说的，使我们处理起这类事情来，有些办法一时难以出手。这种状况既反映了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也反映出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新特点。毛泽东同志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北京的动乱和近些年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风云变化，再次向我们敲起了这方面的警钟！所以我们要善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积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防止阶级敌人趁机破坏和捣乱。

（四）国内国外反动势力勾结，国外反动势力公开插手我国内部事务。我们在前面谈到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时已经指出，国际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渗透的问题。正因这一原因，国际反动势力和国内敌对分子勾结，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则成为新时期阶级斗争的重要特点。北京风波之前国内外敌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们就开始了频繁的联系，为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大量的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他们在海外制造舆论，然后“转内销”蛊惑群众，诸如“倒某某”、“保某某”等谣言就是这样造出来的。人们也不会忘记整个动乱期间“美国之音”成了指挥中心。“美国之音”一天24小时不停地向大陆广播，散布谣言，攻击谩骂我国领导人，为国内暴乱分子撑腰打气，出谋划策。海外敌对势力还派出特务直接和暴乱分子联系。暴乱被我平息，西方国家又立即对我采取“制裁”措施，并接应他们的“精英”叛国外逃。凡此种种，赤裸裸地暴露出国内外反动势力妄想颠覆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阴谋。所以北京暴乱，可以说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反面教育课。

总之，由上所述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特点亦可从不同角度去概括，但总的特征，我们说就是，“和平演变”。“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将成为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和总特点。看过《西方政界要人谈和平演变》这本书的人都知道，自五十年代美国杜勒斯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计划以来，西方国家至今信念不变，战略目标不变。西方国家认为用武装进攻或武力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历史证明是作用不大的，但是用“和平”攻势，就会使“共产主义将从内部解体。”十多年前，尼克松说过：共产党世界手中有一种“强花色”牌，军事力量，西方国家有两种“强花色”牌，经济力量和思想力量。西方国家的两种牌打好了，共产党的牌就难以“出手”，使其失去了作用。1989年6月美国《新闻周报》发表了尼克松的一篇文章，其中说：“惩罚性政策”“不会对中国的强硬的领导人有任何作用”，“我们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向领导人施加影响”。所以，西方帝国主义不惜花费巨额资金，建立专门机构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攻心”宣传。同时以各种方法支持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不同政见者”，以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在四十多年前，如果我们对“和平演变”的理解还不深的话，那么当今形势下就不仅是个理解问题了，而是正视不正视事实的问题了。现在是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在部分地区已经得逞，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国际反动势力从来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

长期的。对于这一点，全国各族人民，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

四

提高对“和平演变”的警觉，对全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不仅在于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党本身的状况如何决定着国家命运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和平演变”的危险主要在党内。

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反映到党内，战争年代不可避免，社会主义时期也不例外。毛泽东同志讲过：“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共产党虽然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先进的党，但党不是在真空中生活，党的活动和社会活动紧密相连。因此社会上有什么风，党内程度不同的都会有反映，这种情况远的不说，只要看看近十年的现实，就会一目了然。前面我们指出社会上出现过几次大的风波，每次风波一方面深刻地影响到我们党的内部生活，另一方面每次风波又离不开党内一些人们的推波助澜。实际上是社会上的斗争与党内斗争相互呼应，互相配合，内外起哄。那些挑起事端的头面人物不少是共产党员，甚至是一些职位不低的共产党员。据有关方面的统计，北京动乱期间仅北京地区的50名“精英”人物，其中是共产党员的就占70%。至于上街“游行”、“声援”、“请愿”的共产党员也为数不少。这就充分说明了在阶级社会里，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与党内的斗争的不可分割性。

十年来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对共产党的腐蚀明显增加了。它突出地表现在：（1）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对共产党员的斗志起了很大的瓦解作用。比如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观念的淡化就是一例。我们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党员不仅缺乏应有的敌情观念，甚至应有的政治观念也已置之脑后了。使得一些党员政治观念模糊，阶级立场动摇。在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冲击下，有一些党员忘记了党的宗旨，丢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色。变成了胸无大志，只围着“孔方圆”转的庸人。在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个性解放”等思想的“污染”下，有些党员忘记了党的纪律，丢掉了党的光荣传统，变成了不起作用的“挂名”党员。（2）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击中了党内一些意志薄弱的人。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的人经不起这种新形势的考验，在剥削阶级思想影响下，走上了以权谋私，行贿受贿，敲诈勒索，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走私贩私的邪路。少数人变成了新的剥削分子，成了社会主义的蛀虫。（3）少数党的高级干部几乎、甚至滑向了机会主义的泥潭。他们不读马列，淡化党的领导，放松思想政治工作，不仅自己昏昏，也难以使人昭昭。北京动乱中50名“精英”，其中司局级或相当于司局级领导干部就占到50%，何等触目惊心。有的高级干部竟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也“说不清”。据有关资料介绍，《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文·托夫勒访问中国后在美国发表文章称：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正在抛弃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观点，”即“阶级斗争观点”，“国家控制生产资料的观点”，“实行中央计划的观点”。同志何看，作为一个久经锻炼的大党的个别领导干部，竟然发展到如此地步！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吗？

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势必造成党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政治素质下降。这种现象

不仅从北京动乱中窥见一斑，从东欧地区的一些国家看得更加明显。我们不是说社会主义国家有“和平演变”的危险吗？这种危险的国内原因正是来自共产党的内部。因为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党又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严格执行纪律的党。如果党内出问题，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出问题，必然关系到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江泽民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四十年来的成就，是在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取得的。错误和挫折的发生，问题也往往出在党内。党的状况如何，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同志提出防止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他把这一思想发展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党内出现了资产阶级。说党内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这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又不符合中国党的实际。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内部是不会，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资产阶级”。但是毛泽东同志指出党内可能出现修正主义，这是不错的。这个观点是建立在社会上存在着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这个基点上的，又是符合生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中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我们现在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共产党内确实会产生“蜕化分子”，或者说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分子一旦掌握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权，那就是最危险的。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党的自身建设，做好党组织的纯洁工作，防止资产阶级及其它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保证党和国家政权永远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既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个实际问题。近年来人们似乎不太敢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本人冒昧谈了上述观点，切望同人提出批评指正。最后摘录几条引文，作为本篇的结束语：

“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①

“离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是空话或者幼稚的幻想”。②

“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③

“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④

1991年3月5日

① 《列宁全集》第32集，第240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642页。

③ 《列宁全集》第32卷，第72页。

④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57页。